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编

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 研究

第三辑

YUYANXUE YU YINGYONG
YUYANXUE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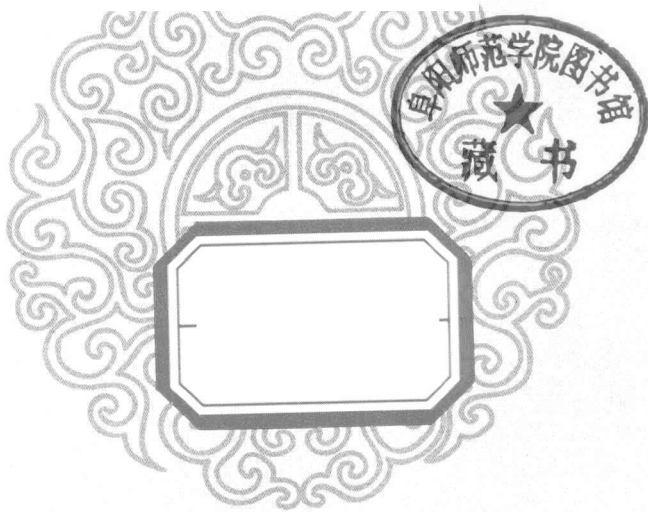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编

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 研究

第三辑

YUYANXUE YU YINGYONG
YUYANXUE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三辑 /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1299 - 1

I. ①语… II. ①北… III. ①汉语 - 语言学 - 文集②汉语 - 应用语言学 - 文集 IV. ①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6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
插 页 2
字 数 53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论草写法对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	张 会 (1)
汉语词汇语义学源流述评	张 琨 (9)
关于含同一语素的同义单双音节动词的词典释义问题 ——兼谈专项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必要性	刘智伟 (22)
基于题元理论的汉语双音复合动词分类 ——以 110 个动词为例	马思宇 (32)
南宁话量词的特点	梁 滢 (50)
浅析汉语新词汇: ABB 式名词	姜 晓 (60)
“X 为”类双音节程度副词初探	刘兰氏 (65)
可能补语不对称现象研究综述	吕俞辉 (74)
“只要 A 就 B”和“只有 A 才 B”的主观量分析	胡秀梅 (84)
现代汉语“V + 于”、“Adj + 于”、“X + 于”组合的性质	王建喜 (93)
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再看“反而”	肖 青 (108)
汉语词汇的语义韵分析及教学研究	刘 妍 (121)
“红”的文化含义与对外汉语教学	苗培颖 吴成年 (132)
“前”、“后”的认知隐喻分析与教学	宋 蕾 (146)
汉语“上”和“下”的意象图式及其多义分析	朴惠苑 (153)
“V 来”结构的语义特征及句法结构分析	陈 颖 (177)
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语义语用研究综述	汝淑媛 (188)
谈谈西方义素分析与中国训诂学义素分析	李文焘 (194)
道迪 (Dawty) 的“题元原型角色”理论及其在 汉语中的借鉴	段 遐 (Sherri Duan) (205)
中西方意义观及其语义研究的比较	孟德宏 (215)
汉语鼓励语的类型与跨文化语用策略研究	元 华 徐丽沙 (231)
韩汉两种语言的一些差异及其相应的翻译方法	申东月 (245)
汉韩因果关系复句连接成分的对比研究	申旻玲 (250)

常用单音多义动词组合关系的汉英对比研究

——以“吃/eat”为例 张江丽 (268)

从认知隐喻理论看汉韩语义表达式的异同

——以由“吃/먹다”构成的词谱为例 尹有贞 (279)

日本学生汉语介词“对”的使用偏误考察与

分析 张美霞 崔立斌 (294)

对外汉语的近义词教学研究

——以韩国学生的近义词学习为例 梁喜镜 (306)

中高级水平留学生使用“因为……所以……”的语篇

误例考察与分析 陆琳 (320)

韩国学生汉语虚词学习的偏误及其原因 崔立斌 (332)

中级汉语水平韩国学生语篇偏误分析 孙红娟 (340)

基于内隐学习机制的第二语言句子产生与句法

教学探索 冯丽萍 (347)

由任务动机研究引发的对外汉语教学之思考 李娜 (353)

教学实习对对外汉语教学法课程内容安排的启示 李彦春 赵晋 (359)

跨文化交际学及其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状况述评 刘卫红 (368)

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兴趣的若干教学因素的分析 卢华岩 (376)

高年级留学生文化课程教学原则探析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的个案考察 宋志明 (383)

外国学生汉语言专业中级听力教学探微

..... 王倩 孙立峰 庄榕霞 (388)

“1+X”:一种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管理模式 吴成年 (394)

小品与高年级留学生视听说课

——以赵本山小品为例 朱胜男 吴成年 (403)

对外汉语教师的身势语在初级口语课中的应用 武晓丽 (412)

对外汉语精读课教材中形名搭配情况调查与分析 步延新 (429)

试论基础句型的语义功能研究与对外汉语教材

编写 伏学风 李晟宇 朱志平 (436)

谈谈初级汉语教材中词语的补充“注释” 舒雅丽 (443)

陌生人之间的会话开头在初级口语教材中的表现 王丕承 (449)

不同时期中级对外汉语教材选文“交际性”的分析 周洁 (464)

海外孔子学院的未来与可持续发展 黄晓琴 (474)

中泰合作培养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项目课程设置的

实践与思考 汪 琦 (482)

海外孔子学院短期汉语课程特色的探索与思考

..... 徐彩华 杨 泉 黄晓琴 (487)

论草写法对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

张 会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草写法在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伴随着人对汉字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汉字使用频率、使用范围的扩大，通过不断精简字形的冗余信息而对汉字形体作出的突破与调整。这个精简优化的过程，符合人的认知规律，也符合信息传递的基本规律。从隶变到简化，从甲骨到行书，从线条到笔画，处处都有草写法的影响，特别是隶变，集中体现了草写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汉字；草写法；隶变；笔画

一 草写法与文字的记录功能

从古老文字产生之初，到文字成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形体不断变化以适应日益繁重的记录功能。文字记录语言并将其传之久远也是将信息传递下去传播开来的过程。因此，符合信息传递规律的字形最先获得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信息的传输要获得最佳的效率，就要兼顾简明与准确。简明会提高效率，但必然增加错误的概率，相反要准确无误地传输信息，就必然携带较多冗余信息，就会使效率下降。

由于记录语言的工具的符号性质要求文字简便实用，容易记忆、识别、书写，要求它们快速、经济、准确地传递语言的信息。所以汉字作为交际工具的属性要求它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来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几千年来，文字所应用的软硬件环境始终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硬件包括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以及扩大文字传播范围的印刷技术；软件方面主要指使用文字的人群以及文字的使用频率与使用领域。在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的古代，要记录语言并将其传之久远，完全靠手抄来完成，而随着社会需要量的不断增加，文字日益普及、使用日益频繁，待抄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人们提高书写速

度和记录效率。当人力有限、书写的载体和工具都无法迅速产生新的变化的时候,就只好从书写符号本身寻求突破。

在文字产生之初,之所以以形表意,是因为字形与字义尚未在人的大脑中建立稳定的联系,字形必须提供足够多的区别性特征信息以帮助识别与记忆,较高的象形度是必要的,这是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而随着文字使用频率的增加、使用人群的扩大以及形声造字法的广泛应用,语言与文字的约定俗成性日趋紧密,字形与字义逐渐在人的大脑中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形义联系、形音联系,单纯依靠形象表意已经成为历史。因而,以往附着于字形的部分信息相对冗余,而过多的冗余信息就会降低文字的应用效率,于是在语言文字的经济法则的作用下,精简那些不影响文字记录功能的冗余信息,减轻人们识记的负担,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就成为一种可能。这种要求反映到手头上就是文字使用者自觉不自觉地对字形的某些部分进行删减改造,对相近偏旁部件进行同化、类化,使字形高效地完成记录语言的功能,这种书写方法我们称之为草写法,这是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汉字变化的结果就是发生了隶分、隶合的大调整,这些变化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汉字的认知能力以及字形与字义在人脑中所建立起来的关联度的日趋稳定。

草写不同于草书,草写法经过进一步发展就成为草书。草写人人可应用于手头,为追求书写效率而结合自己的书写习惯,在基本保证字形可识性的前提下,对字形做某种程度上的简省;这种草写法经过美化可以形成自己的个人书写风格,并上升为一种艺术,不是以记录语言为主要目的,忽视字形的区别度,那么就成为一种字体——草书。一般认为,草书作为一种特定的字体,是汉代形成的,它结构简省、笔画连绵,是汉字作为交际符号而走的另一个极端。它使字形剧烈简化,大大加快了汉字的书写速度;但它不强调构字的理据,简省冗余信息的同时也省却了过多的必要信息,忽视汉字符号的系统性,一旦改变环境就难以认读,从而造成信息接收端的识别障碍,所以它只能在汉字的发展道路上起辅助作用,无法上升到主导地位,最终因妨碍文字记录语言的交流功能而走上了纯粹的艺术道路。尽管如此,草书也对文字形体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简化字有一部分就是由草书形体楷化而来,张书岩等编的《简化字溯源》对1986年版《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482个简化字和4个简化偏旁进行考察,列出明确来源于草书的简化字有92个,如“贝、见、为、书、东、专、长”等。草书还影响到周围国家的文字创造。

二 草写法对隶变的影响

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但隶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众多书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通过频繁的书写实践而寻找到的符合汉字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字形对研究汉字系统的整合非常重要。汉字隶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草写法大量应用的过程。隶变精简字形的冗余信息，优化字形结构并调整庞大的汉字集合，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和构成的规律性，使汉字最终成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经过这一精简优化的过程，汉字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范围大大增强。关于草写法对文字发展的推动作用，郭沫若曾这样论述：“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这段话是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宏观地概括了草写法的重要性。那么草写法是如何影响汉字形体的呢？

纵观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字形简化伴随始终，无论怎样简化，都是在人对汉字的认知心理达到一定的水平后，为了提高书写效率而在表意明确性允许的前提下对字形进行的草化，或者是省却多余的部件，或者是连接一些原本分离的笔道。隶变和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是汉字最大的两次变化。后者虽属人为推动，但所简化之字形多取自己已有之俗体，而这些俗体字有一些就是因手头快速书写而精简了部分冗余信息的草写体。隶变之发生，古人云“篆之捷”，即因文字的频繁应用要求打破原来形体的束缚，而文字频繁应用反映在手头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保留字形的区别性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起落笔的次数与书写路线。

秦末汉初时代草写法已经相当成熟。其实草写法始终伴随着汉字的发展。从考古发现和汉字的构成来看，在商代，毛笔已是主要的书写工具之一，竹木简册是主要的文字载体。由于竹木易腐，我们目前看不到大量用毛笔书写的商代简册，无法全面了解当时日常手写文字的面貌。甲骨文是为特殊目的而刻写于特殊材料上的文字，与毛笔书写之文字相比差距很大。随着刻写量的增加，要提高刻写效率，却受刻写工具的限制，难以像毛笔那样随意控制笔道，所以甲骨文冗余部件的简省比较多，象形字趋于抽象化，字形较之当时毛笔书写的字形已经大为简化，可以说是当时正体的一种草写。例如“鹿”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甲骨文字典》），字形在保留区别

度的前提下进行了简化。

虽然草写法早已应用于手头，但其大量应用当在秦汉之际。那时文字的使用频率与使用范围空前，草写法对字形的破坏最大。战国文字纷乱，秦一统天下，推行书同文政策，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反映到文字上就是隶书的普遍应用。这一时代的出土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睡虎地秦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它们书写时代先后衔接，书写风格基本一致，字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秦末汉初用字的实际情况，对揭示草写法所引起的汉字冗余信息的衰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下字形均出自银雀山汉墓竹简，其变化的过程更是清晰地再现了草写法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在汉字符号化的过程当中人们的心理接受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的。例如：

出处 例字	银雀山汉墓竹简字形			
邑	𠂔	𠂔	𠂔	
言	言	言	言	言
迎	迎	迎	迎	
是	是	是	是	是
兵	兵	兵	兵	兵
有	有	有	有	有

在银雀山汉简中有部分篇目书写相当草率，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书，用笔方面还不像真正的草书那样自由。例如：

迎（迎）、是（是）、武（武）、赋（赋）、定（定）、走（走）（银雀山汉简）

对这一情况，裘锡圭先生曾明确阐述：“在使用古隶的简牍里，可以看到整简、整牍的字都写得相当草率的例子，如睡虎地四号墓木牍，又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部分古书抄本。在这些简牍上可以看到一些写法跟后来的草书相同的偏旁，但是绝大多数字虽然写得草率，字形构造却仍然跟一般的古隶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做草率的隶书，不能看做狭义的草书。”但是这时出现的一些符号代替和连笔书写等比较大胆的草写法也许可以看做是汉字草化的初步尝试。例如：

𠂔 (是)、𠂔 (武)、𠂔 (见)、𠂔 (相)、𠂔 (则)、𠂔 (者)、
𠂔 (焉) (银雀山汉简)

“止”作为构字部件被写作乙，“日”作为构字部件被写作𠂔、𠂔，“焉”字下方被写作两横，这种符号代替的写法不符合汉字的构形原则与以形表意的造字初衷，有的也不能析出成系统的笔画，破坏了汉字构形的系统性，所以在正体隶书中并没有采用此类写法。包括“贝、见、页”的写法，虽然已与今天的简化字写法相同，反映了古人简化字形的强烈意识，但还是受到正体的排斥，只是流传于手头，作为俗体与“貝、見、頁”的正体并存，直到简化汉字后才获得正式承认，成为今天的规范字形。虽然这种草写法不能成为正体，但它的连笔书写原则并没有消失，在汉字发展出了系统的笔画并定型为楷书以后，这种草写法仍在手头发挥着作用。即便是今天的手写字体，人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应用着这种方法。

在草率书写的情况下，最先被简化或遭到破坏的是常用字或者构字能力较强的部件所含的冗余信息，因为这些字或部件构字能力强，使用频率高而与人认知心理结合较为紧密，字形与意义较早地在人的心理上建立了较强的约定俗成关系，所以它们较早打破汉字以形表意的樊篱而发生符号化。朱会萍等将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这段时间内的《侯马盟书》、《望山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和《睡虎地秦简》共五种简文中的草写法进行统计，发现其中许多偏旁的草写法一致，如：心、臣、以、又、弓、巳、已、日、白、子、己、力、方、止等。这些字都是高频字、独体字，具有很强的构字能力，它们的变化自然带来成批字字形的变化，进而影响整个汉字系统。

三 草写与笔画的形成

汉字在小篆以前谈不上真正的笔画。甲骨文时代受刻写工具和载体的限制，原本囫圇的字形被拆分成线条以方便刻写，经过日积月累，此类写法被转用于日常的以毛笔为工具的书写领域，应该对字形分解为笔画起过积极的作用。真正意义上的笔画，到了隶书以后，才渐趋完善。这些有圆有方、有直有曲的构字成分，充分反映了古人的审美意识与天圆地方的哲学思考。在隶变的初期，汉字系统的优化首先从创造系统的笔画开始。

在汉字所有笔画中，横笔与竖笔贯穿汉字发展的始终，它们的形体较容

易适应汉字形态的任何变化。当汉字突破线条走向方块化、平直化时，横竖两笔画最先成熟，横竖笔多的字也最先定型。笔画的最终形成应该离不开书家对汉字的分析意识。这种意识一旦激活，就会以现有笔画为基础对高频的、形繁且近的字或部件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优化，进而扩展到整个汉字系统，那么笔画的析出就彻底完成了。

古文字阶段，汉字字形中弯曲的线条较多。而这种曲笔相对于直笔、斜笔而言，行笔路线较长，如果不能凸显字的特征、不具备区别作用，在提高书写效率的要求下，就是首先被改造的部分。一般认为，隶变是采取拉直或断开的方法来改造篆体的曲笔，从而形成汉字的笔画。事实上，这种改造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在手头书写上渗透，并非秦末汉初突然改之。所以真正的笔画源于当时的手写字，字形比小篆简单得多，笔道清晰，草率自然，在确保字形不失真的前提下，对曲笔所附冗余信息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省减，这个省减的过程就是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人的认知水平与汉字形体充分的结合，使经过调整的汉字成为一定数量的笔画的组合物，可分可合，并兼顾汉字表意文字的特点，保留了相当的理据。在这一阶段的变化过程中，睡虎地秦简是一个典型代表，后代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均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此种写法。例如：

“手”、“木”等字，小篆均作曲笔、，睡虎地秦简已经采取断笔书写，变曲笔为对点形，写作、，到了银雀山竹简中，又进一步将断笔拉直，写作、，减少了起落笔的次数，完成了笔画的创造及对字形的改造，于是基本形成了“扌”、“木”旁。同理，草字头在银雀山汉简中也是如此形成的。

“八”，《说文》云“象分别相背之形”，写作一左一右两个相背的弧形笔画。在银雀山简文中，这两个弧形被分别发展为撇和捺（或点）。其他从“八”的字如“𠂇（半）、（分）、（兑）”等也同时被类化，这样就有一批字酝酿成熟了撇和捺，进而影响其他的字。

从“又”的（有）字，首先是草率书写使它失去了代表象形信息的曲笔成为，然后逆向旋转形成横笔，再加上波折就形成了方正的隶书字形。

“大”字，小篆写作，简文字形是将弯曲的两臂两腿拆作，字形似两个“人”上下相叠，从“大”的“天”、“夫”等字，也是如此，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书写草率，将第一个“人”拉直，再经过隶变改造才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形态，而它们的更为草率的写法，发展成了草书。

受线条式曲笔的影响，当时人们追求字形方正的意识还没有形成，还习惯于圆弧式写法，因此书写时运用的曲笔较多，而较少有方折，许多方框形的字尚有篆书的意味。只有等少量字很像是折笔，实际上是一横和重新开始的一竖。很多后世方折的笔法在当时都是弯曲的。例如“口”及类似“口”形的字，在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简文中均作两笔完成，或者是先写一竖，再一横接一个向左下方的弧形，弧形的走笔更像是一撇，或者第一笔的竖向右作弧形延伸，接应第二笔的末笔，第二笔则在右下角呈圆弧形，这都是篆书曲笔书写法的遗留。在更草一些的篇章中，甚至还有写得像一个三角形的例子。例如：

 (口)、 (目)、 (困)、 (吕)、 (留)、 (可)、
(客) (银雀山汉简)

以上种种写法较之前代文字的写法无疑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笔画与构字部件的形成增强了汉字的可分解性与汉字符号的系统性，每个汉字结构清晰，不但容易书写，而且便于识记。可以说，汉字的笔画就是在这样改造线条字以提高书写效率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综上所述，汉字形体的演变与草简化密不可分。草写法是推动汉字发展的一股力量，它通过简省部件、拆连笔道、改曲为直等方式，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实现了汉字书写记录的高效率，并找到了适合汉字系统的方块字发展道路，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作用巨大。草写的激进性与正体的保守性，二者的合力作用，推动汉字不断向前发展。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言：“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

在关于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中，草写法的作用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是在书写工具、书写材料等外部条件的限制下，书写者在确保汉字的记录功能的前提下，为提高记录效率而从汉字形体本身找到的突破点，它通过不断精简字形的冗余信息，从线条中析出基本的笔画，进而优化字形结构及庞大的汉字集合，使汉字最终成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这个精简优化的过程，符合信息传递的基本规律，从隶变到简化，从甲骨到行书，从线条到笔画，草写法一直都影响着汉字的演变。

参考文献

1.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2. 张书岩等:《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4. 葛本仪:《语言学概论》(修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5.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 年第 3 期。
7. 张会:《论古今汉字形音义关系之变迁》,《学术研究》2007 年第 3 期。
8. 朱会萍等:《试论萌芽期的草书》,《邯郸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9. 吴照义等:《汉代草书与简化字》,《南昌高专学报》2005 年第 6 期。

汉语词汇语义学源流述评

张 琨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汉语词汇语义学发展至今，主要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国外（包括欧美和俄罗斯）语义学、现代汉语词汇学和训诂学。在欧美语义学方面，传统语义学侧重于研究个别词义的历时发展；结构主义语义学提出的语义场理论和成分分析法使词汇语义分析更加系统和细致；认知语义学中的原型理论、意象图式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对词汇语义学作出了新的贡献。苏俄语义学从词典学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实用，其语义研究与语法、语用紧密结合。现代汉语词汇学主要接受了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影响，成果虽多，但仍只停留在对词义现象的平面描写。传统训诂学的词义研究多是分散的、经验式的，而近年来理论训诂学结合现代语义学相关理论，为汉语词汇语义学提出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词汇语义学；源流；国外语义学；现代汉语词汇学；训诂学

词汇语义学，顾名思义就是在词汇层面上进行研究的语义学。“词汇语义学是传统语义学的发展，是现代语义学的分支。”^①那么汉语的词汇语义学从何而来，发展到今日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需要从其源头开始梳理。我们认为，汉语的词汇语义学有三大源流：国外（包括欧美和俄罗斯）语义学、现代汉语词汇学和训诂学。

^①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页。

一 国外的词汇语义学研究

(一) 欧美的词汇语义研究

“语义学”一词最早于1897年由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ichel Bréal)提出,他认为语义学的题材是“研究语词意义的变化过程的原因和结构,即意义的扩大和缩小、意义的转化、意义的价值的提高或贬低等过程的原因和结构”^①。可以看到,布雷阿尔把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地限定为“语词”,因此可以说语义学的开端就是词义学。

受当时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传统语义学对于词义的研究侧重于词义的历时发展,关注词义的演变。其研究多是孤立的、分散的,并没有把词义视为一个系统;并且对于词汇意义的研究仅限于词这个层面,没有深入到词义内部分析出更基本的元素。同时,受当时心理学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语义学还注重从心理角度解释语义变化的现象。比如心理学家温特(Wundt)认为:“只有联想的一般规律才是意义的变化规律,这种联想可归纳为构成每一个具体联想过程的三种基本过程:近似的联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接近的联系及对立的联系。”^②此外,“布雷阿尔把词义看做心理实体,把对词语历史进行分类研究得出的语义变化的普遍机制称为‘语言的思维法则’,施别尔贝尔(H. Sperber)把下意识的感情因素看成意义变化的主要动力,梅耶(A. Meillet)强调语义变化的社会心理背景等,都充分表明心理倾向是历史语义学的重要特征之一”^③。

但到了19世纪末,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已经走到了末路,语言学家们认识到即使是历史研究也不能仅限于对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的机械描述,而要将语言作为系统来研究。20世纪初出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其代表人物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语言研究要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并强调共时研究的优先地位。他将语言的共时状态看成一个有组织的符号系统,其内部成员互相依赖,个体的意义取决于它与系统中其他个体的关系。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结构主义语义学在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并且直到70年代始终占据语义学的主要地位。

① 转引自周建设《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② [苏] B. A. 兹维金采夫:《语义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语言学译丛》1959年第4期。

③ 徐志民:《欧美语义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个独立自足的系统，而语义从本质上来说是语言现象，因此语义结构也是自足的，所以结构主义语义学不考虑心理因素。它主要研究词义的共时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方法是“语义场理论”和“语义成分分析”。“语义场理论”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T. Trier）提出，他认为：词在语义上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把词汇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加以研究，而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只有通过分析、比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确定一个词的真正含义。

“语义场”理论把原本分散、孤立的词汇语义单位变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这跟之前的语义学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人们对这一理论的应用，它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确定语义场的明确标准。大多数学者为了避免主观划定而努力寻找语言学的方法或者至少是客观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在实践中主要还是从概念入手，而且局限在颜色、亲属、家畜、坐具等极小的领域内。

20世纪40年代，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首次论证了成分分析法（亦称义素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的可能性，主张把语音学中的音素分析原则扩大到语法和语义中去。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古迪纳夫（W. H. Goodenough）、朗斯伯里（F. G. Lounsbury）等采用成分分析法，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亲属名词之间的关系。到了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卡兹（Katz）、福德（Fodor）等开始用成分分析法对词义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60年代的成分分析成果被用来为转换生成语法提供语义特征，很快受到现代语义学的重视。

成分分析法跟“语义场理论”联系密切，一组语义成分其实就是语义场中对立的一组成员，而且成分分析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确定词义上属于同一种类或者有相关意义的对比词群，也就是一个语义场。但跟“语义场理论”从宏观角度观察词义系统不同，成分分析法是从微观角度对词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

由于大多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成分分析法能使词义的分析形式化，这是语义分析从感性到理性的一大突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同语义场一样，语义成分的确定也没有明确而客观的标准，对于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语义成分来描写；而且并非所有的区别特征都是正负二分的，因此在处理词义的那些细微特征时，成分分析法显得无能为力。

“70年代以后，语义研究逐渐趋向与语用结合，这个时期出现的认知语义学由于吸收了语言学以外的诸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